序　章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梅贻琦和他的同事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赴乐山、成都一带参观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再是由昆明迁往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答辩，郑天挺兼职该所的副所长，罗常培身为直接授业的导师，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去乐山一线的长江边上，此行正可一举两得。当然，除了这些，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顺便看望一下战时流亡到李庄的老同事、老朋友。

梅贻琦自5月中旬先行抵达陪都重庆，郑天挺、罗常培随后飞至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长江第一古镇李庄临江一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1940年始，日军飞机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这一年的招生工作因此推迟，7月份统考完毕，一直拖到10月才发榜。为应付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西南联大校委会决定，在长江上游泸州以南,川、滇、黔三省边境交会之地的偏僻小城——叙永成立联大分校，该年入学的新生全部迁往分校上课。于是,600余名新生在负责分校工作的杨振声、樊际昌两教授带领下，踏上了入川之路,于次年1月中旬到达叙永。虽比正常时间整整晚了四个月，但总算把书桌安了下来。

此前的6月5日，当江水开始上涨，尚未形成滔天之势时，梅贻琦等从重庆乘船经泸州转陆路到过西南联大叙永分校。那时，整个行程已不顺利，所见所闻更是令人扼腕长叹。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四川，文化衰微，经济凋敝，整个社会混乱不堪。一条陈旧的轮船，原定4点钟起航，不知是机器发生了故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拖到9时才成行。又因临时安插了几十名持枪的兵差，船舱内外显得拥挤不堪。对此，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民族衰败，山河破碎，这些为家国存亡提着脑袋奔走于硝烟战场的热血汉子，此时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当更感苦痛梅贻琦等人发现，“兵士们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时分，“门外有两兵以水冲辣椒末儿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望之顿感悲凉。

自叙永分校返回泸州后，情况更有些不妙，此时江水已成狂暴之势，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待第二天起床后再到江边，又见“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

除了心中一连串的“惊叹”，更多的是焦虑不安。泸州到李庄这段5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遭逢战乱，又赶上夏季暴雨期来临，既没有车，也没有船，何时成行，无人能说得清楚。梅贻琦等连呼“倒霉”，只好在这个江边古城踯躅徘徊，望江兴叹。苦苦等了9天，总算得到了有船上行的消息，于是在27日天色微明时分,三人匆忙洗漱,离开旅馆,各自提着行李,紧随一群乱哄哄、闹嚷嚷、破衣烂履、背篓挑担、呼儿唤女的人流步行到江边码头，搭上了一艘拥挤吵闹的长丰轮，迎着狂奔暴涨的扬子江水，一摇三晃地往上游行进。下午3点40分,船

在叙府（宜宾）下游22公里处的李庄镇码头靠岸，梅贻琦等急不可耐地收拾行李钻出几乎令人窒息的船舱，由“地漂”辅助登岸后，在奎星阁附近临江的“君子居’茶楼稍事休息,于4点35分随两名挑夫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租赁的李庄镇郊区板栗坳（栗峰山庄）走去。

梅氏一行的到来，受到战时流亡到李庄的学术机关、高校及当地士绅的热情欢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宜宾师范专科学校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分别邀请三位名震学界的远方客人到自己驻地、办公场所、课堂,甚至宿舍,进行考察、座谈、演讲。其间,避居李庄的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中央研究院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劳干、石璋如、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郭宝钧、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著名学者以及当地士绅张官周、张访琴、罗南陔、罗伯希、李清泉等等，先后与梅氏一行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会面，并做了力所能及的食宿招待。分散在李庄镇板栗坳张家大院中的马学良、刘念和、汪篯、阎文儒、杨志玖、逯钦立、张政烺、任继愈、李孝定、王叔岷、邓广铭、傅乐焕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读或北大历史系刚“出炉”的青年学子，他乡遇恩师，大有喜从天降之感，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战时岁月，更感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几位青年学子除了热情与谦恭，还以北大特有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贯风格，不时弄出点风趣幽默的段子，给沉寂日久的生活添加一点作料。此次学子们仍没忘记来一番调侃，当场作对联一幅挂在板栗坳牌坊头的大门口。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长由傅斯年代理，郑天挺为副所长，故所作上联是：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下联 贾宝玉乃真宝玉,甄宝玉乃假宝玉,真假宝玉。众人观之，无不拍案叫绝。地势偏僻，正处于酷暑沉闷气氛中的江边小镇，似乎由于梅贻琦等几位客人的到来而多了一丝甘凉与清爽。



梅贻琦

几天的欢乐时光转眼即逝，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已答辩完毕。 7月5日,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商定，清早下山，下午赶往叙府再沿岷江转赴乐山。辞别

诸友后，三人走出位于山顶的板栗坳，下山往李庄镇走去。史语所研究员、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称的李方桂博士携夫人徐樱（民国政要徐树铮之女），连同十几名故朋新友，恋恋不舍地送出一里多地。众人来到一个高高的山坡，李庄镇内房舍在望，梅贻琦等再三辞谢后，送者方止住脚步。在大家不停地抱拳遥祝间，梅氏禁不住慨叹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下山之后，梅贻琦等再次来到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小院，专程看望一直萦绕他们心头、最为挂念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此时的林徽因患有当时号称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正发着低烧，几乎失去了工作、生活能力。只见她斜卧在一张行军床上，瘦削苍白，浑身虚弱无力，说话困难，再也没有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那种谈锋甚健、豪情不止的风采了在此前的6月30日，梅贻琦等人曾专程看望过梁、林夫妇，当时的情形是“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小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

今天，尽管梅氏一行心中颇为踌躇，恐再令这位多情的病中才女神伤别离，在无法解除其身心痛 苦的情形下，准备多坐些时候，尽可能给对方多一点抚慰，尽到一点师长和朋友的责任。交谈中，梅贻琦得知，由于李庄相对闭塞，除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外，学术研究也很难拓展。刚到此地时，身体尚好的林徽因主要整理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的报告，现在重病在身，已无法工作，考察报告由梁思成一人整理，但迟迟未能定稿，令梁、林夫妇甚感苦恼与无奈。当林徽因得知联大叙永分校将有可能回迁昆明时，不禁悲从中来，谈到自己不适应李庄气候、水土，导致病情加重，提出想重返昆明，与西南联大那些教授朋友们在一起的愿望。作为前辈的梅贻琦听罢，不禁凄然，但未置可否，原因是“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下午3时，长丰轮靠到李庄码头，梅贻琦等作别送行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等好友,即行登船,时年40岁的梁思成坚持独自一人踏“地漂”（趸船）把客人送到轮上,此举令53岁的梅贻琦深为感动，更生出“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的牵挂爱怜之情。

“想不到离开北平才四年光景，徽因的身体竟糟糕如此，真是不堪回首呵！”梅贻琦望着梁思成那同样瘦弱的身子和疲惫的神情唏嘘叹息着。梁思成听罢，表情忧郁，默不作声，梅贻琦想再说几句宽慰的话，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说起，遂侧身望了一眼大江对面那气势磅礴的桂轮山和山中白云深处若隐若现

的一座古庙宇（当地称雷峰塔），灵感忽闪，轻轻说道：“思成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四年前的今天，你们小夫妻正蹲在五台山佛光寺的梁柱上放声高歌吧？”

一句话触动了梁思成敏感的神经，他稍感意外地惊愣了片刻，随着一句低沉沙哑的“梅校长……”，眸子已经湿润。梁思成咬紧嘴唇冲梅贻琦点了下头，抬手想掩饰那双发烫的眼睛，随着一阵风浪刮过，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长丰轮鸣笛启程了，岸上的梁思成望着浩浩长江中渐渐远去的船影，耳边回响着梅贻琦这位尊敬的长者离别的话语，四年前那个令人心血荡漾、颇具传奇色彩的场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

1937年6月下旬的一天，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踏上了赴山西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林夫妇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得力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也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迎来了他们古建筑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对现存古建筑学的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唐代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不但具有独到的特色，并负载着这一文化血脉转承启合的关键性使命，如能亲眼目睹唐代的建筑遗存，是任何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者都心向神往、梦寐以求的事。从整个历史长廊的大框架推演，自现代至唐朝，虽经历朝更替和无数次战火兵燹与天灾人祸，按事物的正常发展消亡规律推断，应该仍有少许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存于某个角落，发现它的踪迹甚或一两件完整的实物并非绝无可能。于是，寻找这样一座存留于人间的世间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萦于心的梦。

从1932年开始，服务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刘致平等同事，几乎考察了华北和中原所有可能遗存古建筑的地区，得到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只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唐代建筑的踪影始终没有显现，这不免令他们感到遗憾和怅惘。就在他们风餐露宿、四处奔波、心情郁闷之际，有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不无得意地放言道：在中国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了，要想看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唐代作品。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诸国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可。大唐王朝近300年的辉煌功业，在它兴盛发达的本土上，似乎真的是随风飘逝，一点荧光也不复存在了。

正当梁氏夫妇怀着执著的念头，连同对日本人之说不服气的双重心理，为心中的梦想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命运之神悄然降临了。他们偶然得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书中披露了敦煌第61号洞窟中的两张唐代壁画。这两张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代庙宇尤为引人注目。梁思成、林徽因在对这两幅壁画做了精心研究后，突然爆出灵感的火花，神情大振，发出“天不欺我，佛祖佑我”之慨叹。他们很快查阅了北平图书馆《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计》等相关志书，从这些珍贵的史料中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是号称五百里清凉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创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之时，佛光寺被毁，12年后，随着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改变，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的规模，从此该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重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开始了新的历程。

梁氏夫妇在向中国营造学社报告后，带领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的酷夏季节，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颇具神奇意境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

梁思成一行四人带着野外考察的必备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一切考察手续后，由太原折向北行，先乘汽车走了128公里，因前方道路崎岖，泥泞遍布，便弃车改换毛驴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左摇右晃地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从不远处的山巅渐渐沉没，在夕阳的光照里，前方一处殿宇正沐浴着晚霞的余晖，以恢弘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雄姿风采，傲然屹立于苍山翠海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的眼睛一亮，朝思暮想的佛光寺就这样突然、神奇地展现在眼前。

几人跳下毛驴，怀着对古老文化的敬畏仰慕之情，在西天最后一抹晚霞的瑰丽光影里，一步一步小心而虔诚地向圣地走去。

寺院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个年幼的哑巴弟子在守护，待他们说明来意，那扇厚重斑驳的大门随着“咯咯”的声响开启了。一行四人鱼贯而入，



佛光寺大殿

瞻仰左右，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格外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坐像，侍者环之而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平台左端为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坐像，询问老僧，答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过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的初步观察，梁氏夫妇断定面前景物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振奋不已。

经过几天的考察研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随着相关的物证推演而出。这座古老庙宇的大殿建成于晚唐的公元857年。这个时代，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感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这座巍然屹立于中国大地上的气势宏伟、盖世绝伦的大唐建筑殿堂，不仅令那些所谓“要想看唐代木构建筑需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的妄言得以破灭，同样让那些充满偏见、随声附和的东洋或西洋的所谓专家大师，不得不闭上嘴巴。

梁、林及两位助手于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在离开寺院之前，林徽因又悄然步入那座曾赋予自己激情与梦想、贮藏着大唐文化鲜活骨血与生命的大殿，望着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寺的施主——唐代的宁公遇夫人那端庄美丽的塑像，心中蓦地生发了一种强烈的崇敬感念之情，她对着塑像凝望了许久，返身来到院子对梁思成动情地说道：“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林徽因这位女弟子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大德仕女，于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此时的梁思成非常理解妻子的心情，怕伤感的气氛过于浓重，很快扭转了话题，并向相送的寺僧作最后告别。梁思成告诉老住持，自己准备写信向太原教育局报告这一重大发现，并“详细陈述寺之珍罕，以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等等。临别之时，梁思成、林徽因双双向老僧鞠躬，表达对这位



1937 年，林徽因在山西佛光寺测绘经幢。

寺院守护者的敬意与感谢之情。向以谈锋锐利著称的林徽因，面对颤颤巍巍、抖动着身子的寺院老住持和那位年轻的哑巴弟子，情绪激动，几度语塞。她眼里汪着一潭深情的泪水，答应明年再来，继续对寺院进行更加详尽的考察，还要争取带上政府的资助前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满脸沧桑的老僧望着面前这位奇女子真诚的表情和道白，干瘪的双手合于胸前，口诵‘阿弥陀佛”，躬身施礼道谢，言称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照顾这座寺院和佛祖神灵，等待再次与几位大德施主相会的日子。

梁思成、林徽因连同两位助手走出山门，在盛夏的北国灿烂得有些刚烈的黄昏里，骑上毛驴离开了佛光寺，左盘右旋向山下走去。

待他们来到附近豆村一家鸡毛小店住下，正为此次神奇的发现和成功的考察沉浸在甜美的梦境之中时，远处，卢沟桥，枪声在暗夜中骤然响起……

第一章　大溃退

平津沦陷

当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梁思成等人没有——当然也不会听到。此前，他们有一种预感，日军迟早要对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动手，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他们离开佛光寺的这个夜晚。北平郊外已是炮声隆隆，大开杀戒，中日双方军队激战正酣。在阵阵喊杀与哀鸣声中，一场血光之灾，以泰山塌崩、大地陆沉之势席卷而来。

第二天，五台山地区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壮阔的山河越发俊秀雄奇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骑上毛驴，离开了那家风雨飘摇的客栈，怀揣发现佛光寺的狂喜，意犹未尽地围绕山中较知名的几个地方继续展开寻访调查,先后走访了静灵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等庙宇,但没有获得理想的成果。几天之后，他们来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向西北方向的古城代县奔去。抵达县城后，梁思成决定暂住几日，除了恢复已极尽疲惫的体力，也借机好好整理和回顾此前考察搜集的大量资料

7月 12 日傍晚，辛苦忙碌了一天的梁思成接到一捆报纸，这是专门拜托当地朋友从太原带来的。因连续几天暴雨，山路被洪水冲毁，拖延了几天才送到。梁思成躺在帐篷中的帆布床上把报纸慢慢摊开，目光刚一接触，整个身心如遭电击，血“轰”地一下冲上脑门，顿感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起身冲出帐篷，表情紧张地对正在外边乘凉休息的林徽因和两位助手大声高呼：“不好了,打起来了,北平打起来了!”

众人大惊，急忙围上来，只见报纸一版的大字号黑色标题格外耀眼刺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北平危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时，战争已经爆发五天了。

北平危在旦夕，家中老小在炮火中都不知生死，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也一定是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必须立即赶回去。但据报纸透露的消息，津浦、平汉两路已被日军截断，只有北出雁门关，经山阴道赴大同，沿平绥铁路转回北平。

次日清晨，梁思成一行从代县出发，徒步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此时，梁思成深恐平绥路一旦断绝，将不知何时返回北平，又恐已获取的珍贵资料有所闪失，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等测绘资料，暂时返太原，一面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一面待机返北平。主意已定，几人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梁、林夫妇和莫宗江出雁门关，沿着唯一的回归之路，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此时，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的局势，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筒点燃了引线，火星四溅，烟雾升腾，天崩地裂的时刻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祭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后，终于采取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夜，早已占领北平城郊宛平和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一一〇旅吉星文团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四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的悲壮序幕随之拉开。



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

7月25日，日军大规模攻击平津战争的前奏——廊坊之战正式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连续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与日本和谈的幻想，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复攻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猛烈进攻。京郊南苑，二十九军所部将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南苑、长辛店一带战场，中国军队爱国将士拼死抵抗，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及助战飞机步步进逼，仅一日之间，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3000多名官兵当场阵亡。在敌军的凌厉攻势下，气脉已竭的南苑守军开始溃退。

7月28日，宋哲元携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师长冯治安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北平陷落。

7月30日,天津陷落,华北大部落入日军之手。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在隆隆的炮火与日机的轰鸣声中，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燕京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

当时正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批平津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的时局伴着恐怖的谣言，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三位校长坐卧不安，忧心如焚，其情状正如梅贻琦所言“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在会场内外，三校校长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水火中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人

7月29日，地处城西的天津南开大学突然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炸，校园内的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房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紧接着，日军派兵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为出色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时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在地，继而老泪纵横，痛心不已。次日，张伯苓强忍剧

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蒋梦麟

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并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了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技于平津，此三校为中坚”，因此，日本方面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变前就把平津等地高校作为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实施“精神上彻底征服”之战略。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日日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8月中旬，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的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校长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定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每校委派一人，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秀，南开何廉。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亲自担任。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并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的长沙圣经


张伯苓

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9月28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秘密传达，早已心神焦灼、翘首以盼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口头通知后，纷纷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走了，但仍有众多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纲要草案，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求生路外，只有听天由命。而此时的梁思成、林徽因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由于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建筑学语)的支柱,曾在7月16日北平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于日人之手的北平，必须设法离开。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到来之际，梁思成于匆忙中来到设在与故宫一墙之隔的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同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为了不使这批珍贵的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仓库一个保险柜中，“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否则无法开启。

正当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共荣”的看法。此时的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文化界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于是，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



1930 年林徽因与母亲、丈夫和女儿

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外，生活用品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一辆雪佛莱牌汽车，不管贵重与否，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自己的政策“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

1937 年9月5 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林徽因的母亲，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以及另外两位教授，匆匆走出了北总布胡同三号院的家门。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尽管此前医生曾警告过，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这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之苦，林徽因无可奈何又有些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这座相伴了十几年的故园，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凭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此时，三面受日军与汉奸队伍围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

一行人提心吊胆地躲过了日军与汉奸的盘查，总算到达了天津，梁思成一家和老金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好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在国外发表，并匆匆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

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船启碇了，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眺望陆地渐渐远去的梁、林夫妇，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会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那座留下了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了”。

长沙遇故知

一路颠簸动荡，梁思成一家与朋友们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身体本来就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便患病发烧。暂借朋友处休息几天，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个两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梁家刚刚安顿下来，从北平流亡到此地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朋友们纷纷上门，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日趋酷烈的政治、战争局势，预测着中国未来的前景。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又带一位朋友找上门来，梁氏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是自己的老友李济。

就如同在流亡的路上，梁、林夫妇没有想到与北平一别就是九年一样，此时他们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傍晚的不期而遇，意味着未来九年的生活，将与面前的两人以及他们所在机关的朋友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之情所能言表，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清华学校毕业前夕的李济(摄于 1918 年春)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1907年随同任小京官的父亲李权（号郢客）进入北京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以官费生的身份赴美留学。与他同船离开上海码头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几位，如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而坊间名气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徐志摩此次自费赴海外就读，是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曾出任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梁本意是期望这位风流潇洒的才子，按照政治家的要求在美国接受民主政治和财政管理方面的学习训练，回国做一位改良社会的政治家或实业家。但事与愿违，想不到徐氏一去，就和当年他的先祖徐福率领一大群童男童女东渡扶桑，为秦始皇寻求仙丹妙药一样，不但把自己的承诺和使命忘得一干二净，还在大海那边安营扎寨做起了繁殖人口的事务来。徐志摩的欧洲之行，改变了梁氏的初衷和徐氏自己的人生轨道，开始在事业与爱情两条船上来回摇晃，闹得左右不安，四方不静，还险些搅了梁家一段天作之合的美满姻缘。不过这个时候的徐志摩与江苏宝山淑女张幼仪结婚已近三年，并有了一子。这个风流倜傥、潇洒飘逸、谈情说爱的大师，与娇小可人的一代才女林徽因相识，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岸来回游弋，兴风作浪，生发出一段凄苦绝伦的情爱纠葛，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李济与徐志摩到达美国后，双双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李攻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 1923年，李济以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旋即踏上了归国的途程，时年27岁。一只鲜活亮丽的“海龟”，就这样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太平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曾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有着较大的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没有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

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点，正如若干年后李济自己所言：“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结识了在他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丁文江（字在君）。丁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算是较早的一批“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地位，甚为学界同人推崇敬仰。正是得益于“丁大哥”的鼓励与支持，李济才重返母校清华，加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行列。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博士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

国学院筹备之初，曹云祥想让学界新锐派领袖胡适出面主持，但胡氏还算个明白人，他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的存在，说自己没有资格承担如此之重任，顺便推荐了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三位大师。根据这一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的居处一一聘请。因种种原因，为天下士子服膺的章太炎没有受聘。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曾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等职），自然属于旧派人物，经过反复权衡，又偷偷跑到天津，私下征得已被赶出紫禁城的逊帝溥仪的“恩准”后，总算答应就任。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启超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深的密切关系与感情，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同样留学美国，并进了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对这段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言道：“我与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